

文史藝術在美國

朱·約·農·

講到文史、藝術在美國的地位，恐怕祇有美國學術界人士自己來談較為真切。

哥倫大學的哲學教授查理士·佛蘭克爾(Charles Frankel) (註) 說，文史、藝術在美國的被輕視，為時已久，至今並未改變。大致上，他說，文史、藝術受到四方面的攻擊。

首先，文史、藝術被指責為神話的創造者。說人類如何有其獨特的理性(迥異于禽獸)，因而為人類創造了真正的快樂和幸福，制訂了至高的德行，並控制了它自己的命運。

其次，文史、藝術自以為有其獨特的權威性，而且世代相傳，師徒都這麼說，無視於社會的公論，更沒有為此取決於公眾的意見。

第三，文史、藝術祇是自我表現和自我陶醉，對工業社會並無實質的貢獻和用途。別說它們對外科醫生沒有直接的關係，就是對市場分析員、統計員或銀行作業員，也沒有事業上

的用處。大多數的場合，它們簡直浪費時間、浪費金錢和浪費言詞。

第四，文史、藝術是離大眾而獨存的空中樓閣。但它們把自己塑造為八呎之軀的籃球中鋒，傲視羣倫，而且卓然獨立，不與外來小民同流。因而，它們在哲學、文學、藝術、歷史，乃至音樂中建立了它們孤傲的堡壘，離羣獨居。

為什麼會招致如此的指責呢？

這位哥大的老師便說：從事文史、藝術的人自來便養成了逃避大眾的習慣。他們有一種強烈的動機，不許自己的研究或工作成果去迎合從事勞役的人。換言之，他們一直來為迎合少數，不是為多數，而工作。

當然，這不是西洋文史、藝術的真正目的。但在西洋社會中，凡要參加這個特殊俱樂部的人，必須接受這個組織的成規：最主要的一點是：多用腦，少用手。

為什麼要有這麼奇特的入會條件？恐怕誰也說不上來。不過，把文史和藝術的前身追溯到中世紀的四科（算術、幾何、天文、音樂）和另三科（文法、修辭和理則），你就知道它們有傳統的因素在裏面。特別是在民主革命成功之後，它們的貴族權勢，便一直保存了下來。

由此看來，文史、藝術在西方，本質上是貴族社會（不是平民社會）的遺物。今日的一個哲學老師，儘管知道他所傳授的學課無助於會計學或建築學，但他仍然要為哲學的宏揚，作貴族式的辯護。

不過，從農業跨入工業的社會過程中，必然會有人發現文史和藝術的次要性。

當大鍊鋼廠的鼓風爐發展到最高程度時，沙士比亞和畢卡索等人的地位，自然會給降低。除非你不想進入核子或太空時代，不然你就得犧牲蘇格拉底或康德心目中的美麗天國。

這些文史、藝術方面的偉人，也許可以成爲大鍊鋼廠或飛機製造廠老闆的寵兒，但很難在鼓風爐周圍或裝配線上的人羣中得到信徒。

電影、電視、小說、詩歌、音樂，無疑地，足以豐富人生；有時候在精神上確是不可或缺，但究竟不像電力、自來水、下水道、或捷運系統那樣不可一刻無有。

爲了求得文史和藝術在西方工業社會中的生存，文史和藝術家必須每隔若干年，推動一種可見或不可見的文藝復興（或革新）運動。

十九世紀以來，那些奇異的運動真是接踵而至。特別在藝術方面，如達達派、野獸派、印象主義、抽象主義等等，都是某種程度的掙扎。

在哲學領域中，存在主義固然影響深遠，但本質上，它未嘗不是哲學家在工業社會中的一種反抗運動，一種求生存運動。

從頭至尾，它必須否定科技的價值，攻擊工業社會的醜劣，以及科技扼殺人類文化的罪惡。

受害最大的可能是神學和傳統的宗教。形而上學的玄思，也許不會爲了工業社會的蔑視而消滅（因爲

它是獨立存在的），但據以生存的宗教組織，却因此發生動搖。

儘管如此，尋求文史和藝術樂趣的人，還是十分的衆多。絕大多數是志趣所趨，小部份是環境所迫；也有不少人是由於登龍有術，容易在這方面飛黃騰達。

在學院裏，同樣求一個學歷，文史和藝術是被認爲軟性的，而理工是硬性的。當然，這裏面還意味着程度和難易之分。事實上，沒有學院經歷的人，也許可以在文史、或藝術、或影藝界求得生存；甚至可以在這些方面睥睨一世。但理工就沒有這種便利。

另一方面，幾乎所有能動筆的，都是文史和藝術界的人。他們也幾乎佔領了所有可供佔領的文字據點。世界上能口誅筆伐的，幾乎也都是這方面的人。

在五十年和六十年代的美國，當科技在太空發展中把理工科人員哄抬到最高峯時，文史和藝術界人士藉上述的據點和勢力，維護了他們搖搖欲墜的地位。固然，仍有很多一般性的文史和藝術性刊物，在那個當兒被逼歇業。（表面上的理由是製作費用驟增，而廣告收入驟降。）同時，甚多文史和藝術界人士，都不

得不向理工的園地裏去求一枝之棲。

那是美國文史和藝術界人士在本世紀中的最低潮。在情況上，比卅年代的經濟大蕭條更難堪。因為在不景氣中，文史和藝術固然無人問津，就是理工和科技也銷不出去。

這一次七十年代的世界性經濟衰蔽，文史和藝術界人士在美國受害的情形，就比較緩和。原因：他們在政治、經濟、和學術界建立了若干的避風港。

首先，他們取得了「知識界」的領導地位。換言之，他們變成了「知識分子」的獨佔代表。他們把從事科技的人趕出「知識界」，稱他們為科學家、工程師或物理學家。

在概念上，他們在社會上造成一種印象，使人覺得科技人員不是「知識分子」，或是劣等「知識分子」。因為，在他們看來，知識分子是用大腦的，科技人員是用小腦的。

今日美國的學術界，由於這些「知識分子」的猖獗，使得他們在經濟衰蔽中，還能保持他們的聲望，至少能在氣勢上凌駕科技人員。

在這些人中，大家比較熟悉的，有費正清、鮑大

可、和孔傑榮等人。從他們中文譯名之漂亮，你就知道他們的大腦有多發達。就是季辛吉，本質上也屬於這一流的人物。一旦他離開了政治，他的前途大概也祇能在這方面求發展。（剝去了外殼，你就知道他不是三頭六臂。）

這些人全都是「學術虛構」的傑出人物。他們在彼此「相輕」和「相重」的交替運用下，互抬身分，最後建立了這個世紀西方學術界最有魔力的一個東西：「權威」。

「權威」這個概念，也正是今日西洋文史、藝術家賴以生存和發展的一個主要力量。這是他們經過一世紀的努力，從基督徒經院勢力圈中規掠過來的。沒有這個「權威」特權的掩護，今日的西方知識分子，絕沒有今天的體面和他們強大的剩餘影響力。

但仔細審察一下，你就知道這個所謂「權威」的力量，也是十分脆弱的。誠如前文所說，西洋的文史、藝術家，都是中世紀貴族社會的繼承人，全無基層的勢力和支持。

除了犯有「崇拜狂」或「輕信狂」的人，這種「權威」的接受面，實際上是很狹窄的。另外，恐怕祇

有那些懦怯的開發中國家的「知識分子」，會爲他們的危言所驚懾，不敢正視他們的「權威」。

本來，「權威」就像泥塑木雕的菩薩那樣，祇能懾服心靈空虛的人。

在學術界，製造「權威」的另一方法，是在學院中創設各種各樣的新學科（當然是與文史、藝術有關的）。這正是美國和若干歐陸國家今日欺騙年輕學子最不道德的一種手法。

有趣的是：那些低度和中度開發的國家，最喜歡仿效這一類的時髦，因而使它們久久停留在虛有其表的階段。正像非洲新開發的一個國家，在它設立的第一所大學的經費預算中，首先列舉的，是採辦學士「道袍」的錢，一般的可憐。

要知道，西洋文史、藝術家創設這些新學科的目的，是有意促進學術界的浪費和擴張，因而可以製造更多師資的職位（當然還是文史和藝術方面的爲主），以及吸引更多祇求空名不求實際的學生。

這種學科的缺乏實用價值，對於美國這樣一個經濟強國，不會構成問題；但對開發中國家，那是真正的浪費。

中古時代的西洋經院學術，至少還有一個共同的目标：求靈魂的得救。二十世紀的西洋學術，是求靈魂的不得救。

新的文史和藝術思想，必須是「叛亂」的好；新的宇宙觀，也必須是沒有邊緣的才會令人有生逢其盛的快感。

也許西洋的知識確是在成長和進展，但祇見有人在前面把它分類，使它更細密、更專業化、更互不相關，却沒有人在後面把它歸納、汰舊和存新。

理論上，每個時代的史學家都在舊紙堆裏整理舊史，但越治越紛歧。每個時代的文學家，也都在大幅度地反映時代，創作車載斗量的巨帙偉構，但從未見改變了人心。

所以，西洋哲學家乾脆把人性看作獸檻那樣，分成許多格子。每個格子代表一種主義，裏面的人便是什麼主義的信奉者。

他們讓每種主義都建立一種獨立性，信奉這些主義的人也各有各的自尊性，附和民主平等的原則。同時，他們不讓新的主義來打倒舊的主義，而祇讓新的取代舊的，或繼承舊的。

所以，沒有那種主義能統攝一個太長的時期；也沒有那種主義在「死」了許多年之後，再能完全「復活」的。

這是上述「權威」之外，西方文史、藝術家賴以發展他們勢力的另一重要憑藉。這和前述西洋學術界廣設新學科的主旨，是同一原理。

你看十大暢銷書和十大熱門歌曲輪迴更新之快，你就知道這裏面混飯吃的西洋史、藝術家（這裏再加音樂家）運思技巧的奧妙。他們跟出版商和其他有關的商人結合，開創了文史、藝術界的一個世界性大商場。

各種光怪陸離的新奇知識的輸出，在美國也算是政治和經濟勢力之外，用以保持世界地位的一股強大力量。

在政府和學術界的安排下，平均總有千人以上的美國學人或團體，在世界各地巡迴旅行。其中易於推銷的，自然還是文史和藝術方面的知識（包括音樂和舞蹈）。

這就是大家所熟知的美國文化交流運動。
令人高興的是：所有這些美國學人和團體的成員

，幾乎全都是受過訓練的樂觀主義者。（就是越南淪亡的前夕，據說還有美國學人在西貢等地貢獻這一類的樂觀思想。）

維繫這種樂觀思想的力量，是經濟；不是美國的民主政治。而建立美國經濟基礎的，是農業和工業，不是文史和藝術。

目前的美國文史和藝術，顯然已失去了建國時期的輝煌地位。日後的趨勢，也祇會扮演工業社會的配角——也許是一個重要的配角。

爲了某種理由，工業社會的巨擘，決不願意讓從事文史和藝術的同胞，顯得窮迫無依。這些巨擘必須要培養文史、藝術家的地位，使他們能在社會上保持一定程度的體面。

最顯著的力量，是那些實力雄厚的基金會，如福特基金會、洛克斐勒基金會和普立茲基金會等；以及那些專門容納學術界人士的研究機構，包括各著名大學和獨立的研究院（如布洛克林研究所和蘭特研究所等）。它們都有能力提供巨額的獎金，或充實的研究設備，給特定的學者從事特定項目的研究。

在這種環境下，工業安撫了那些有研究癖的學者

，也堵塞了那些鋒銳的批評家之口。

同樣的情形，在熱門音樂衝擊下岌岌可危的美國大都市的交響樂團以及在反傳統勢力影響下失去羣衆的畫家、音樂家、雕刻家，乃至小說家、詩人，也都直接或間接的依靠工商界鉅子的關顧、支助、或佈施而生活。

因而，你會知道：爲什麼這些從事文史和藝術的美國文人，會給美國新聞界譽爲「僅有的美國悲觀主義者」了。

註：查理士·佛蘭克爾，五十九歲，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隨卽自一九三九年起在哥大任教，傳授哲學至今。其間也曾擔任國務院主管教育暨文化事務的助理國務卿（一九六五——六七年）及出席世界教科文組織美方代表團團長（一九六六年）等職。著作包括：「理性的信仰」（一九四八年）、「現代人個案」（一九五六年）、「教育及其障礙」（一九六八年）及「哲學的樂趣」（一九七二年）等。

王鴻仁譯

羅丹傳

大衛·韋斯原著

每冊55元

楓城出版社

隱地著

歐遊隨筆

一本現代東方人的西遊記

每冊40元·爾雅出版社印行

張伯權譯

長夜

每冊35元

遠流出版社印行